



# 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 编译文集 2

## ——佐米亚、边疆与跨界

---

郁丹 苏发祥 李云霞 主编

学苑出版社

A stylized, black and white line drawing of a row of evergreen trees, positioned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 目 录

环喜马拉雅研究中佐米亚、边疆的学科发展意义（代序） .....	郁丹	（1）
“佐米亚”及其影响力 .....	Jean Michaud 著 陈建华 覃丽赢 译	（12）
认知地理和无知地理——在东南亚的跳跃规模 .....	Willem van Schendel 著 李全敏 译	（47）
喜马拉雅中心区在“佐米亚”吗？——一些跨时空的学术与政治思考 .....	Sara Shneiderman 著 曾黎 译	（75）
关于边境与边界的叙述——中越边境地区地方商人机遇和挑战的纵向研究 .....	Sarah Turner 著 贺佳乐 潘艳勤 译	（105）
固定的疆界，流动的地景——19世纪20年代英国对东孟加拉北部的扩张 .....	Gunnel Cederlöf 著 李伟峰 梁欣欣 译	（134）
“我们的脊梁是铁打的”——加姆尔里妇女运动的政治生态学 .....	Georgina Drew 著 左涛 译	（163）
藏区和东南亚高地——反思藏学研究的知识背景 .....	Geoffrey Samuel 著 才让三周 四郎翁姆 译	（181）
血、精子、灵与山——昆布（尼泊尔东北部）的性别关系、亲属关系和世界观 .....	Hildegard Diemberger 著 乔小河 张荣 译	（198）

- 延伸边境——限制、流动与泰缅克伦难民中的难民公众  
..... Alexander Horstmann 著  
邵媛媛 译 (251)
- 泰国高地社会与低地社会之间的宗教连续性  
..... E. Paul Durrenberger Nicola Tannenbaum 著  
王舫 刘增娟 译 (271)
- 尼泊尔属于南亚吗? ——非后殖民性情境  
..... Mary Des Chene 著  
刘玲 海冉 王笛 译 (283)
- 阿富汗-巴基斯坦湿地中对“例外政权”的争夺  
..... Oskar Verkaaik Sarfraz Khan Samina Rehman 著  
海冉 王笛 刘玲 译 (298)
- 山地与平地..... Robins Burling 著  
谭斯元 译 (316)
- 不被统治的人还是僵化的人? ——东南亚山地人将来是什么样的  
..... Bernard Formoso 著  
王挺 译 (324)
- 战争与森林的政治生态学——反叛乱与国家本质的形成  
..... Nancy Lee Peluso Peter Vandergeest 著  
杨漪 尹仑 译 (346)

## “佐米亚”及其影响力<sup>①</sup>

拉瓦尔大学人类学系 Jean Michaud<sup>②</sup> 著  
昆明理工大学 陈建华  
云南民族大学 覃丽赢 译

**摘要：**社论一方面阐述了如何将历史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在亚洲高地边缘及之外的地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阐述了如何通过运用诸如高地亚洲（Haute Asie）、东南亚地块（Southeast Asian Massif）、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地区（Hindu Kush Himalayan region）、喜马拉雅地块（Himalayan Massif）等不同的术语，尤其是詹姆斯·斯科特新近出版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一书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让学术界重新探讨有关亚洲高地研究的理论。

**关键词：**佐米亚 东南亚地块 亚洲高地 国家 边界

“佐米亚”的首次出现于在地理学期刊《环境与规划 D：社会与空间》上刊登的一篇文章<sup>③</sup>，它是由荷兰社会科学家冯·申德尔（van Schendel）于2002年发表的。该文章对“佐米亚”做了深刻的分析，并对“区域研究”的

---

<sup>①</sup> 除 JGH 三位具有启发性建议的匿名读者外，我的同事们也给予了此文的初稿具有建设性的评论。特别是萨拉·特纳（Sara Turner），马格努斯·费斯克修（Magnus Fiskesjo），萨拉·施耐德曼（Sara Shneiderman）和莱夫·琼森（Leif Jonsson）。感谢詹姆斯·C·斯科特帮我联系上马格努斯。作为 JGH 的主编，威廉姆·格瓦斯-克拉伦斯·斯密斯为这一非同寻常的尝试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支持，我在此真诚地感谢他，也感谢他的同事在学术上给予的付出与合作。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纽黑文，CT：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原文出处：Jean, Michaud. 2010. Editorial: Zomia and beyond.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5: 187-124.

<sup>②</sup> 作者简介：Jean Michaud，加拿大拉瓦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佐米亚（zomia）概念的原创学者之一（其他两位耶鲁大圩 James Scott，阿姆斯特丹大学 Willem van Schendel），为郁丹教授环喜马拉雅研究重要合作伙伴，共同获得加拿大国家社科基金。

<sup>③</sup> 冯·申德尔《认知地理和无知地理——在东南亚的跳跃规模》，《环境与规划 D：社会与空间》20，6，2002，第 647-668 页。

固定边界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见解；文章提议把从西喜马拉雅山脉西部横穿的青藏高原，一直到东南亚高地的亚洲高地考虑为一个明显区别于以通常意义划分的亚洲区域：中亚（内陆）、南亚、东亚、东南亚之划分出的政治历史实体。“佐米亚”是一个隐匿的跨国区域而又不完全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区域。它是一个以人口稀少、历史上被孤立、政治上被周边强国所支配、各种边缘性以及具有多样语言与宗教为特征的区域。2007年，在与回应他2002年提议的研究西喜马拉雅区域的学者进行讨论之后，冯·申德尔尝试性地将“佐米亚”进一步向西北延伸。<sup>①</sup>这样一来，正如向东延伸一样，从逻辑上讲，他把视野投向了喜马拉雅西边的高地。这是社会与地理空间领域的创新，也是本文章讨论的中心议题。

## 历史与人类学的融合

本文将史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相融，并与人文地理学一起做些研讨。对于历史学的期刊采用这么一个不同寻常的立场，我们需要给予一个解释。因为亚洲诸高地很少引起历史学家们的关注。许多历史学家对高地缺乏兴趣，并理所当然地忙着翻阅与探索中国、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和越南等国丰富的历史档案，无暇顾及高地，从而导致了这些高地社会的“隐型性”。也正是他们对高地兴趣的匮乏，让冯·申德尔巧妙地把这一现象称为“无知的地理”（geography of ignorance）。<sup>②</sup>假定这些区域的人口总和超过120万（如果包括大“佐米亚”，人口就超过150万了），并且给他们正式贴上“少数民族”的个体标签，这样的“无知”就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了。那些善于在田野调查的学者，比如人类学家、人类地理学家，还有语言学家，已经爬上山坡去接触并记录了这些人群的生活、语言及习俗，也许历史学家并不那么喜欢爬山。按詹姆斯·斯科特的话，文明只爬上有一定难度的山，这一点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学家们多半滞留在后面。<sup>③</sup>

我们不得不欣赏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于199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文章中处理探讨这一问题时表现出的幽默。文

---

① 2008年2月的私下交流。据我所知，冯·申德尔还没有将这一延伸与最初2002年的佐米亚一起发表。

② 冯·申德尔《认知地理与无知地理——在东南亚的跳跃规模》。

③ 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第一章。

中他概述了主流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长期以来相互怀有的错误认识与偏见：

似乎有一些历史学家，他们接受的人类学教育止于马林诺夫斯基，或始于列维·施特劳斯。他们认为人类学家们无视变迁或敌视变迁，只呈现分布已有人类居住的遥远角落里的一些没有变迁的社会的静态图景；而一些人类学家，其历史观念大体是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他们所做的是风教劝鉴，一个接一个地讲述西方文明中一个或另一个插曲。<sup>①</sup>

文化人类学家接着论述到：

这场争吵的另一件事情可能是有关大与小的问题。历史学家对于席卷大范围的诸如资本主义的兴起、罗马的衰落等思想与行为的偏好，以及人类学家对小型的、界限分明的社群如特瓦世界（哪一个？）、阿洛人（谁呀？）的偏爱，导致历史学家指责人类学家废话连篇，坠入模糊与无关紧要的细节之泥潭；而人类学家却指责历史学家不联系真实生活错综复杂的当前情势，与人类学家声称所拥有的“感觉”相互没有任何接触。作为壁画家与微图画家，他们都有一定的难度看到彼此所体现出来的泰然自若之完美性与宏大设计。<sup>②</sup>

换言之，克利福德·格尔茨当时认为，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相互误判而且彼此缺乏信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的论述中所隐含的立场是双方通过对话获得的利益大于继续相互忽视。克利福德·格尔茨当时也许是对的，而且正如卡尔布（Kalb）和塔克（Tak）的《批判性连结》（2005）<sup>③</sup>所给出的例子那样，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对话正在进行着。

早在1963年，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就写道：“历史学家熟悉人类学也许会使他们受益匪浅，这一建议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也并不离经叛道。

---

① 克利福德·格尔茨《历史学与人类学》（History and anthropology），载《新文艺史》（*New Literary History*），21，2，1990。

② 《历史学与人类学》，载《新文艺史》。

③ D·卡尔布，H·塔克《批判性连结：超越文化转折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纽约：伯格翰（Berghahn），2005。参见约翰内斯·费边《带有态度的人类学：批判性论文》，斯坦福，C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第4章“民族学与历史学”。

托尼 (Tawney) 教授也曾在 30 年前 (20 世纪 30 年代) 伦敦经济学院就职演说中提出同样的建议, 人们对这样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的建议也常常不以为然。”<sup>①</sup> 遗憾的是, 托尼教授的建议并没有如凯斯·托马斯所希望的那样被广泛关注。事实上, 直到涉及这一议题中具体的地理区域时, 历史学家们才开始尝试性地涉足人类学家们的领地。杨斌的《风云之际: 云南的形成》<sup>②</sup> 是一些历史学家们如何对这一区域历史写作的例子。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 杨斌采用的材料主要是文字材料; 当涉及像云南这样一个边缘省份, 在元、明、清的统治下, 这样的文本通常是用汉文典籍。然而, 云南少数民族 (傣族、白族、纳西族、彝族) 已经受过教育数个世纪, 并且用本族的文字而非汉字写成了编年史和大事记。面对搜集这些具有地方性又富有奇特资源所出现的语言复杂性时, 这些由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文本价值在学术界常常被忽视。更糟糕的是, 那些现存的族群依个体和集体记忆而口承的历史也处于被忽略的境地。

我们知道, 口证和口承传统的口述史研究动态表明, 其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们走到一起来并把相关的学科融为一个分支学科, 尤其是民族史闻名。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杨·范斯纳 (Jan Fansina) 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在非洲研究口承传统时, 就其学科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sup>③</sup> 然而, 研究“佐米亚”区域的历史学家们对口承历史的应用还处在起步阶段。相比之下, 即使他们的资料来源经由语言和文化的翻译, 人类学家们非常独特地把此类资料包括在了他们的民族志中。到目前为止, 在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出版的有关东南亚与中国通史中, 人类学文本在历史学家的阅读书目中占有很少的突出地位: 从 D. G. E. 霍尔 (Hall) 和沃尔夫拉姆·埃伯哈特 (Wolfram Eberhard) 到杨·普卢威尔, 再到尼古拉斯·塔林 (Nich-

① 凯斯·托马斯《历史与人类学》, 24, 1963, 第 3-24 页。

② 杨斌《风云之际: 云南的形成 (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20 世纪)》,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 2009 年。

③ 杨·范斯纳著, H. M. 莱特译《口承传统: 一项历史方法论的研究》, 伦敦: 鹿特莱奇和柯甘保罗 (Toutledge & Kegan Paul), 1965 年; 同前, 《作为历史的口承传统》, 麦迪逊, WI: 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 1985 年。参见伊丽莎白·童金 (Elizabeth Tokin) 《口头表达的内涵: 人类学的视角》, 口承历史, 3, 1, 1975, 第 41-49 页。

olas Tarling) 和维克多·列伯曼 (Victor Lieberman)。<sup>①</sup>

当然,微观史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也没有被他们排斥,直到最近,它在一些地方受欢迎的程度还没有另外一些地方受欢迎程度高。欧洲的历史学家写了许多历史专著,比如一个村庄的故事集,或有关社会阶层的各种状况,包括少数民族群体,采用了他们几乎所搜集到的材料,比如,口承史、考古学、视觉图像、语言学等。最著名的村史可能是出版于1975年的《蒙塔尤》。<sup>②</sup>同样,北美土著历史学家们几十年来也写了几百本此类研究论著,紧接着就是非洲和马来西亚的历史学家。毫无疑问,微观史正在成为主要的历史学范式。<sup>③</sup>然而,当我们转向其他社会,西方和亚洲的历史学家都已证明没能把他们的叙述扎根于口承文化当中,几乎没有采用来自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的口传研究成果。

在这一期特刊所涉及的亚洲部分,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评估并未完全失其相关性。在研究亚洲高地的时候,由于这些边缘和碎片化的社会远离区域中心与全球大国,且处在它们行政管理范围的边缘。正如本文章所表明的观点,主流历史学家们虽然没有完全缺席,但他们很不情愿像近邻学科的同事们那样对高地社会进行深入研究。尽管历史人类学领域(或民族史)已经欣欣向荣数十年,亚洲情境中(南亚部分除外)的“历史人类学”仍然处于起步阶段。<sup>④</sup>正如我在别处所说的,人类学有时可以被描述为一个通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它从不羞于挖掘临近学科的富矿。<sup>⑤</sup>从列维·施特劳式研究方法

① D. G. E. 霍尔《东南亚史》(第4版),香港:麦克伦南出版社,1981年;杨·普卢威尔《东南亚历史地图集》,莱登:布里尔,1995年;沃尔夫拉姆·埃伯哈特《中国史》,伦敦:鹿特莱奇,2005年(1950年第1版);N. 塔林《剑桥东南亚史》(两卷本),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维克多·列伯曼《奇怪的平行:全球情境中的东南亚》,C. 800-1830,卷一:《大陆上的统一》,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卷二:《大陆镜像:欧洲、日本、中国、东南亚与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 伊曼纽·勒·洛伊·腊督列《〈蒙塔尤〉——欧西坦村,从1294到1324年》,巴黎:伽利马德出版社,1975。

③ 高卢·靳兹卑格 (Carlo Ginzberg)、约翰·泰德施《微历史:我所知道的二三事》,载于《批判性探寻》1981年12月,第10-35页;詹姆斯·F·布鲁克斯、克莱斯·迪科斯和约翰·沃顿编辑《小世界:微历史的方法、意义及叙写》,桑塔,Fe, NM: 美国研究学院出版社,2008。

④ 有影响的贡献当然是伯纳德·S·科恩的《历史学与人类学:走向和解?》,载《跨学科历史学期刊》1981年12月,第227-252页。参见凯斯·托马斯的《历史与人类学》之总结部分,载于阿兰·伯纳德和斯宾塞编辑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伦敦:鹿特莱奇出版社,1996年,第273-277页。

⑤ 让·米肖《偶然的民族志学家:东京-云南边境上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1880-1930》,莱登、波士顿,MA: 布里尔学术出版社,2007年,第9页。



意义上来说，人类学家是多面手；他们喜欢组装多种元素，通常用稀奇古怪的拼图进行跨越学科界限的拼接，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这里面也包括历史学。<sup>①</sup>

实际上，凯斯·托马斯说过，直到20世纪早期，人类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探索。<sup>②</sup> 这是在包括民族志和参与观察等标志性研究方法出现并成为它核心组成部分之前的事。后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和A. R. 德拉克利夫·布朗等人类学的探路者，虽然成为这些新的领域研究方法的拥护者，但他们也保持与历史学强大的学术联系。20世纪6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及其对手宏大叙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人类学家们比以往更热衷于将社会过程进行历史化。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包括列维·施特劳斯1952年出版的《种族与历史》，E. E. 埃文斯·普理查德于1961年在曼彻斯特的著名讲座“人类学与历史”。<sup>③</sup> 再后来1980年，在很多修辞性的与哲学性的争论当中，在乔治·斯托金、埃里克·沃尔夫、马歇尔·萨林斯和其他人的著作中，与历史方面的关联不断增强，这导致了今天历史概念本身就是文化的和具体的这一根深蒂固的信念；并认为，没有历史分析的人类学研究是不完整的和有瑕疵的。<sup>④</sup> 历史上诸如档案研究、编年史和大事记以及口承史阅读、收集生活史、进行心理映射等导向性的方法已经成为社会人类学的主流。

这样一来，走在一条其路径越来越交叉的旅途上，亚洲的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们将会从相互承认与学术性地相互接触中获益匪浅。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克利福德·格尔茨以这样诱人的远景总结道：

---

① 公平而言，一小部分历史学家也开始使用东拼西凑（bricolage）这个概念。早期的撰稿人有K. M. 贝克，其文章《论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载于D. 拉卡拉布拉和S. L. 卡普兰编辑的《现代欧洲学术史：重新评价及新视角》，第197-219页，依塔卡，NY：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2；马里奥·拜奥其里奥利，其文章《科学革命，拼图与礼仪》，载于洛伊·波特和马库拉斯·泰西主编的《国家情境下的科学革命》，第11-54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弗里德里奇·库珀《冲突与连结：反思殖民非洲史》，载于《美国历史评论》，第1516-1545页，99，5，1994年。

② 托马斯《历史与人类学》，第273页。

③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种族与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2年出版的手册；1961作为一本书重印；E. E. 埃文斯·普理查德《人类学与历史》，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大学出版社，1961年。在这一著作中，普理查德大胆宣称：“正如没有历史学，人类学就一无是处，没有人类学，历史学也就一无是处。”

④ 法拉利奥·法乐利《“我们的祖先很少说话”：华伍鲁的知识与礼仪》，收于勒昂昂纳·E·温莎编辑《哈尔马贝拉及之外：摩卢卡斯的社会科学研究》，莱登：KITLV出版社，1994年，第195-212页。

最近兴起的人类学家不但对过去（我们一直对此感兴趣）感兴趣，而且也对历史学家如何使过去充满意义感兴趣，以及历史学家不但对文化奇异性感兴趣，而且也对人类学家将这些文化变得离我们更近的方法感兴趣，这绝非仅仅是一种时尚；它将使其产生的热情、它引起的恐慌与它导致的混乱得以存续。<sup>①</sup>

## 从东南亚地块的视角检验“佐米亚”

本文关注亚洲腹地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其覆盖区域与欧洲相当。随着它在2002年的问世，冯·申德尔的“佐米亚”概念及其重要性和逆流性在学界一直被边界政治和制度性崇拜的区域研究所深度左右，因而证实了它具有足够的权威性，能使许多社会科学家对其默认，从而对其作出稀少的反响。然而，这一概念的确引起了该区域学者的关注，它也是直接讲给他们听的，也表现出了与他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情况一致性。这一兴趣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政治科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最近的一本书，该书聚焦于冯·申德尔的“佐米亚”区域东部地区。<sup>②</sup>再往西的喜马拉雅地区的学者，本期刊刊以萨拉·施耐德曼（Sara Shneiderman），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帕德森·格尔施（C. Patterson Giersch）为代表，都在此次大规模的合作中看到了问题的相关性。他们认为，这一高地区域的人们拥有共同的传统，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西藏政治文化影响来加以解释。研究高原东部区域的其他研究人员，对把跨国方法运用于这个区域及其人群的做法时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有限。<sup>③</sup>我和约翰·麦基依过去意识到我们所谓的东南亚地块（Southeast Asian Massif）少数人类群体跨国性的重要性，并曾建议将那里关于边缘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从学术性地绑定的民族情境中剥离开来。<sup>④</sup>然而，冯·申德尔用来讨论这一区域的纯

① 克利福德·格尔茨《历史学与人类学》，第333页。

② 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③ 利姆·俞·汝克（Lim Joo Jock）《地缘权利领域、东南亚与中国：一个拱桥地块的地缘策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84年；革罕·维耶瓦尔登纳（Gehan Wijewardane）《东南亚大陆跨境族群》，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90年；格兰特·埃文斯（Grant Evans）、克里斯托弗·胡顿（Christopher Huton）和夸·昆·恩（Kuah Khun Eng）编辑《中国与东南亚相遇的地方：边境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新加坡，堪培拉：东南亚研究所、艾琳（Allen）和欧文（Uwin），2000年。

④ 约翰·麦基依、让·米肖《陈述：东南亚大陆的山民领域》，载让·米肖编辑《动荡的时代与恒久的民族：东南亚大陆的山地少数民族》，第1-25页，理查蒙德，苏雷：可桑出版社，2000年。

宏观立场，以及它背后的理论假设，已经使我们当中的几个人感到有点不舒服。<sup>①</sup> 所以，在这一专题性的期刊里，每一位作者都在他（她）的田野中用有充分根据的知识，就他们如何回应“佐米亚”这个概念及其所包括的范围，提供了一种解释。

使“佐米亚”这个概念成为同时受全球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都感兴趣的空间，不仅在于它的跨国性，及其就世人已接受的亚洲次区域之跨区域性，还在于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临近的几个政体联系在了一起。类似情况在费尔南德·布劳戴尔（Fernand Braudel）的基础研究中提到了很多，比如地中海是一个人类、商品和思想流动和交流的空间。许多学者也强调了波罗的海、印度洋或爪哇海与此是同质现象。也许把这类分析方式应用到高山地区有较大的难度。高山地区与沙哈拉沙漠、冻原地区或亚马逊丛林类似，与海洋地区相比，较少有人涉足。虽然并非没有人类居住，但山地地区连绵起伏的地形与多样性的气候，使这些人类群体与临近的人口稠密地区分隔开来，而他们之间仍然容许发展出诸多的商路来。<sup>②</sup>

也许，将佐米亚与其他比如安第斯山、阿尔卑斯山等高地进行比较会更富成效。作为一个严格的社会空间，它具有独特的社会、政治与历史逻辑，无论是作为一个庇护所还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即使是松散地，高地总是附属于更大区域的政治历史过程。多少世纪以来，这一包容性每当高地及其周围的低地地区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就形成了，并伴随着既有利于高地社会又有利于低地社会的朝贡关系与互补性的商品贸易一体化。商品流通与人口流动的模式通常沿商路与迁徙路线从人口密集的地区到人口较少的下一个地区，比如南美洲的东西海岸之间，东西欧之间，还有在我们的例子中的印度与中国。<sup>③</sup> 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与高加索山脉符合这一描述的情况，而落基山脉与乌拉尔山脉并不大符合，原因是这些山脉与周边地区长期以来缺少人类群体的聚集。

与安第斯山脉的高原文化或地处欧洲中心的阿尔卑斯山脉相对照之下，“佐米亚”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区域，仍有待学术上给予它进一步的关注。它就像一

---

① 福摩萨（Formoso）《“佐米亚”人抑或“佐米亚”比人？东南亚大陆民族存在什么样的未来？》。

② 帕德森·格尔施《同商人、和尚与麝香穿越佐米亚——处理地理学、贸易网络与内陆、东部与东南亚边境》，第215-239页。

③ 马努斯·菲斯克修（Magnus Fiskesjo）《采矿、历史与反国家之瓦——中缅之间的自治政治》，第241-264页；萨拉·特纳（Sara Turner）《关于边境与边境叙述——中越边境地区地方商人机遇和挑战的纵向研究》，第265-287页。

个新近发现的星云，只是最近才出现在雷达上。然而，佐米亚的历史特点毫无疑问是具有全球性特点的。除了刚刚说到的，我们可以认为，它所引起的作为范围宽广的空间之兴趣，在于那种不但把各亚洲高地连接在一起，而且也把亚洲高地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并进行全球贸易。多少世纪以来，这个区域的贸易以各种层次的规模进行着：一个河谷与另一个河谷，一个农奴小国与周边的农奴小国之间；在宏观规模上，包括那些广泛与丝绸之路思想相联系的洲际交换的长途贸易。<sup>①</sup> 虽然从未成为连结远东与南亚、中东与欧洲贸易的中心，但因为穿越这些高地的商路及其提供的珍贵而稀有的物品，它们已经成为各贸易模式整体的一部分<sup>②</sup>。这些物品包括动物、动物产品、棉花、亚麻、草药、银等贵金属，还有宝石。玉米与鸦片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sup>③</sup>

玉米 (*Zea Mays* L.) 在伊比利亚人 16 世纪从美洲引入亚洲之前，并不为亚洲人所知。它很快在中国西南山地边缘地区普遍种植起来。它既不需要肥沃的土壤也不需要灌溉；它可以种在山坡上，而且十分适应高地温和的气候。作为一种作物，玉米证明对山民极富吸引力，易种植，好收割，方便储藏，也不会耗去高地土壤太多的营养物质。它的根系有助于山坡水土保持，而且可以在同一块地里同时种上黄豆、豌豆和罂粟等经济作物。玉米还可以用手磨磨成细面，那里家家户户历史上几乎都有一台手磨，于是，玉米成了猪的主要饲料，人偶尔也吃一些。最后，同样重要的是，玉米成了家酿白酒最受欢迎的原料，高地大力消费这种自熬酒，而且正形成一个蒸蒸日上的生意行当。<sup>④</sup>

高地人借助这一独特的谷物，成功地扎根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当前，玉米也帮助低地中国汉族民众应对人口压力，协助他们向不那么肥沃的山地与高原迁移，在那些过去只有山民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

鸦片 (*Papaver Somniferum*) 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区域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更有说服力的例子。由于欧洲人和印度人在中国大量销售鸦片，19 世纪出现了

① 菲斯克修《采矿》，第 241-264 页。

② 安·麦克斯威尔·希尔 (Ann Maxwell Hill) 《商人与迁徙者：东南亚云南籍华人的族姓与贸易》，纽黑文，CT：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 年；威廉·G·克拉伦斯·史密斯 (William G. Clarence-Smith) 《东南亚大陆及其边境地区马的饲养》，载于彼得·卜姆伽德 (Peter Boomgaard) 与大卫·亨利 (David Henley) 编辑《小所有者与饲养者：东南亚食物作物与家畜农业史》，莱登：KIRLV 出版社，2004 年，第 189-210 页。

③ 这两个例子来自让·米肖《东南亚大陆各民族历史词典》，拉纳母，MD：斯卡雷克劳 (Scar-crow) 出版社，2006 年（于 2009 年作为《东南亚大陆民族百科全书》重印），第 149-150、183-186 页。

④ 见萨拉·特纳《关于边境与边境叙述》，第 265-287 页。

最高额度的消费水平（根据麦考伊提供的资料，1870年中国有1500万瘾君子）<sup>①</sup>。英国东印度公司明显地刺激并巧妙地维持了这一趋势。根据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允许西方人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几乎自由地销售鸦片。留给中国人与入侵者进行竞争的唯一选择就是倡导并支持国产鸦片。居住在适宜鸦片生产地区——也就是西南石灰岩山区和高原地区——的人们被鼓励种植罂粟，生产鸦片原材料并卖给政府。国家反过来加工原材料并将成品销往内陆市场。<sup>②</sup> 那些通过缅甸与印度支那（Indo-China，指越南为主的东南亚地区）到达中国“佐米亚”地区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西南高地的许多鸦片生产者殷勤备至。鸦片成品也从西贡和加尔各答装船运输到欧洲在中国海岸的商埠和世界其他有中国移民定居的地方。正如迪斯卡尔·盖廷（Descours-Gatin）最近所说的，这一贸易是如此的有利可图，而需求数额又那么巨大，以至于，在1898年到1922年间，这一行业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总殖民预算的贡献率在25%到42%之间浮动。<sup>③</sup> 佐米亚地区的高地少数民族也因此成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参与者。19世纪下半叶震撼华南的暴动与反叛，比如“藩塞”与苗民反叛，还有接下来向半岛高地的移民潮，至少可以部分地与控制销售鸦片的强烈愿望相联系起来。<sup>④</sup>

进入20世纪下半叶，控制鸦片生产与销售对各种好战群体来说仍然至关重要，它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进行武装斗争的资助手段。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中，甚至美军也协助运输、储存、分销与消费鸦片及其衍生品（海洛因或吗啡）。但当这一区域的战事消退后，各国政府更多地看到了这一奇特贸易有害的一面而不只是它带来的好处，于是开始正式结束这种贸易。他们得到了那些现在必须遏制由归国部队带来的毒瘾问题的国家的资助。所有东佐米亚区域国家最终在1988年签署了《联合国禁毒宣言》。大规模的鸦片生产及其

---

① 阿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McCoy），同凯瑟琳·B·利得（Cathleen B. Read）和里奥纳德·P·亚当斯（Leonard P. Adams）《东南亚海洛因政治》，新加坡：Harper Torchbook，1989年；参见皮埃尔·阿诺德·仇威（Pierre-Arnaud Chouvy）《鸦片：揭开罂粟政治》，伦敦：I. B. 陶里斯出版人，2009年。

② 大卫·A·贝罗（David A. Bello）《鸦片与帝国的局限：中国内陆地区禁毒1729-1850》，剑桥，MA：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5。

③ Chantal Descours-Gatin, *Quand l'opium finançait la colonisation en Indochine*, Paris: L'Harmattan, 1992; Philippe Le Failer, *Monopole et Prohibition de l'opium en Indochine: le pilori des Chimères*, Paris: L'Harmattan, 2001.

④ 罗伯特·D·杨克斯（Robert D. Jenks）《在贵州的暴动与社会混乱：苗民的反叛，1854-1873》，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4年。



一系列后果，现在已经转移到另一个主要战争地带，这一次则位于大佐米亚西部地区：阿富汗和中亚高地。这一地区的全球性联系继续发展着。

## 来自亚洲高地的早期欧洲视角

现在，我建议我们进入佐米亚区域亲自见证一下它的范围与独特性。作为开始的第一步，我们可以借助地方层次的视角来理解其中一些错综复杂的因素。我们的田野向导是一位孤独的殖民传教士阿罗伊·肖特（Aloys Schortter）。他在一个世纪前就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记述并发表了他所观察到的一切。1890年初，刚刚任命的天主教牧师随（巴黎）海外传教会到达了贵州，并很快发现自己被安排在兴义府（Hin-y-fu）。这是一个位于遥远的贵州教区的边远小镇，也就是在现在的中国贵州省。<sup>①</sup> 接下来的43年里肖特在少数民族部落中传教，直到63岁离世，他称这些部族为苗族和夷族，后者也被称为彝族、倮倮族或怒苏人。



图1 阿罗伊·肖特（最上排中间）和贵州的皈依者，资料来源：（巴黎）海外传教会。

在任职期间，他表现出勇往直前的坚强意志：除了完成艰巨的宗教职责，

<sup>①</sup> 有关肖特的更详细的生活与研究，见米肖《偶然的民族志学家》，第145-150页。

他还设法找时间搜集资料，就他日常观察到的未来的皈依者进行全面的民族志描述。1908年，时年50岁，他在《人类学》（*Anthropos*）期刊上发表了一些他观所察到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份两年前刚由神圣语言协会的威廉·施密特神父发起的期刊，威廉·施密特神父专门从事传教士民族志、民族学和语言学研究。肖特这样写道：

对于民族志学家和语言学家……来说，贵州就像一个植物园、一个民族学博物馆。那里陡峭的高山与深邃的山谷形成了巨大的箱盒式空间，其间生活着已被归类或分类了的许多部落。他们是被中国汉人入侵者战退之前构成中国最初人口的土著种族存活者。他们是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出现之前的早期人类群体；我们的贵州教区是中国行省制度未形成之前的典型地区。<sup>①</sup>

这位牧师接着为他的读者解释了这个地区的地理状况和人类群体的分布情况：“苗族，就像灌木丛一样，覆盖了贵州的山区。夷（彝）人，就像巨大的树干，将他们稠密的村庄向肥沃的坝子延伸。”<sup>②</sup>

肖特的散文是珍贵的，因为他把这些高地区域富有意义的群体包括在他的散文里面。在第一个引文中，他总结了高地地区不同居民之间可能存在的历史性等级关系。这里，他注意到了由陡峭的高山围绕着的独特而崎岖不平的地形，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地方文化长期地与世隔绝。这一万花筒式的民族是古老的，也许比汉人还古老。从第二部分节选内容中，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按一定的至少是基于人口数量的功能性安排，具有一定特征的民族占据了独特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s*）：人口相对较多的群体如彝族占据了适宜精耕细作之灌溉稻作农业的高地坝子。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封建体制接着就发展了起来；亦即，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关系，是由土地分配状况和控制军队的传统精英决定的，后者还拥有一群顺从的农民<sup>③</sup>；而人口较少的部族如苗族，则选择更高且互不相连的生态位中去生活。这一差异性指向了一种政治等级关系，根据这一等级关系，生活在中等海拔高度的群体面对更高海拔的群体时，夸耀自己比后者享有更多的权力。然而，两者都是该地区

① 阿罗伊·肖特《贵州（中国）部落民族志手记》，载《人类学》，1908年，第397-398页。

② 同上，第403页。

③ 乔治·孔多米纳斯（Georges Condominas）《论泰国政治体制的演变》，载于《民族学》，41，1976年，第7-67页。

的土著居民之一。第三者，也就是汉人，与前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肖特对这一观察的简短阐述，其目的既不是要延续也不是要倡导一种关于这些高地居民的原生论、本质论观点，或一种社会科学家普遍所持的理论观点。<sup>①</sup> 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我们接受一些事实。在地面上，人与空间总是相交的，当地理上的遥远性与经济政治的孤立性相当的时候尤其如此。当这种孤立性被那些在历史上的掌权者划分为原始人或野蛮人的从属者当作工具来使用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这一过程已经导致了那些被认为从属者的人做出了有人所谓的“现代性土著化”的适应性回应。<sup>②</sup> 正如我们在本文中进行的讨论，斯科特甚至大胆地说道，这些群体或多或少地把国家的概念抛在身后逃跑了，加入到更公平的政治形式中去了。<sup>③</sup>

## “佐米亚”的命名与界定

肖特当时内心深处受到个人意识形态和自己所处的环境的限制，他心里并没有一个像“佐米亚”这样包罗万象的概念。申德尔的观点值得赞许的是，他号召学术界对真正处于国家与文明体边缘的这些地区与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否则，只会将它们忽略并仅仅作为边缘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和落后的地方来看待。运用这种方法，冯·申德尔承认了他从前辈那里得到的灵感。这一陈述是20世纪80年代由一个其基地位于尼泊尔的发展群体——国际山地一体化发展中心——提议的，该中心发布“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地区”地图的目的更多的是想让世人了解这一区域，而不是出于学术的目的。当时没有引起太多学术性的探讨，但在这里，它作为“大佐米亚”（greater Zomia）明显的前身引起了我们的兴趣。<sup>④</sup>

<sup>①</sup> 斯蒂文·弗希（Stephan Fuchs）《反本质主义：一种文化与社会理论》，剑桥，MA：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J. D. 艾勒（J. D. Eller）和 R. M. 卡夫兰（R. M. Coughlan）《原生论的困乏：民族依附之神秘性》，载《民族与种族研究》，16，第181-202期，1993年。

<sup>②</sup> 马歇尔·萨林斯《什么是人类学启蒙？二十世纪的一些教训》，载《人类学年度评论》，28，pp. i-xxiii，1999年；萨利·恩格尔·梅利（Sally Engel Merry）《跨人权与地方积极主义：绘制中间层》，载《美国人类学》，108，1，第38-51页，2006年。

<sup>③</sup> 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sup>④</sup> 冯·申德尔《认知地理和无知地理》，第655页，n. 20。国际山地一体化发展中心（ICIMOD）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服务于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八个地区成员国——阿富汗、孟加拉、不丹、中国、印度、缅甸、尼泊尔与巴基斯坦——的地区性知识发展与学习中心”：<http://www/icimod.org/>（2010年3月31日查询）



接着，冯·申德尔带着“佐米亚”之名出现了，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加以解释的概念。冯·申德尔的田野调查是在印度东北端，缅甸与孟加拉交界的小邦国中进行的。“佐米亚”这个新词所代表的地方很尴尬地处于一个其情境需要一个更宽泛、无所不包的标签的地方。命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创造性行为。它也需要一个强大的逻辑支撑，容许一个合理而方便的名字符合通过这样命名的尽可能最宽泛的主体或社群。在这一场命名的论辩中有几点被遗漏了，也许是因为“佐米亚”这个概念本身太有诱惑力了，以至于未加批判地被接受了。冯·申德尔陈述道：“‘佐米亚’源自佐米（zomi），一个描述缅甸、印度、孟加拉许多讲钦-米佐-库基语（Chin-Mizo-Kuki）的高地地区的概念。”<sup>①</sup> 这些地方方言，主要由居住在缅甸西部、印度最东端和孟加拉东部相接的边境钦人山区（Chin Hills）一小块地方为中心的人类群体所讲的，所以高度的地方文化，与其他高地没有共性。钦人山区以外的高地社会没有用佐（zo）或佐米（zomi）这个概念的，这一点弗兰克·莱曼已经在1963年提到过。<sup>②</sup>

冯·申德尔很精明。“佐米亚”像香格里拉（Shangri-la）或香娜都（Xanadu）一样，是一个时髦的名字，人人都想咬它一口。它很有可能与媒体和学术出版商胶着在一起，因为他们对这个词所包含的神秘气味有种嗜好。我也怀疑，无论在普通学术圈还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中间，我们每天都在接近这种创造与传播一种“新的令人兴奋的”亚洲人群——“佐米亚”人（伯纳德·福摩萨已经使用了），而“佐米亚”人研究紧随其后。<sup>③</sup> 但我们必须记住，关系到一个广袤而极富差异性的现实，“佐米亚”作为地域名称仍然是个蹩脚的选择。用北美做类比，这就相当于落基山脉（the Rockies）的命名——用一个英语名字（Rockies）为一个从中美洲延伸到阿拉斯加的巨大山脉——源自一个育空（Yukon）东部阿拉斯加人使用的地方民族地名。作为一种选择，亚洲高地（Haute Asie）的概念，广泛地运用于法国喜马拉雅山研究界，也许提供了一个更有前途的选项。但我想，坚持认为冯·申德尔的新词应该是完美的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目的性，而且“佐米亚”大可继续留用。关键是，正如伯纳德·福摩萨问到的那样，这个名字后面的现实是否真能

① 冯·申德尔《认知地理和无知地理》，第653页。

② 弗兰克·K·莱曼（Frank K. Lehman）《钦人社会结构》，厄巴纳，IL：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3年。根据莱曼的说法，在钦语中，佐（Zo）是边缘之意，米（Mi）是人的意思；佐米（Zomi）于是可以翻译为“边缘地带的人”。（2008年3月个人交流）

③ 最终，学者们会意识到“佐米亚”和“亚马孙尼亚”（Amazonia）放在一起考虑时潜在的和諧之处，一些新词也会随之出现。

够为亚洲高地的社会与历史研究带来意义。

迄今，佐米亚这个概念最著名的运用来自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一书。在这本富有学术启发性的书中，詹姆斯·斯科特明确地提到了冯·申德尔的著作，并把“佐米亚”作为他进行明确的分析。然而，斯科特称之为“佐米亚”的区域与冯·申德尔的提议是明显不同的。为了公平看待这种不一致性，斯科特在前言中进行了简单的陈述，但没有进一步给出细节：

“佐米亚”是一个几乎包括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并横跨五个东南亚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四个省份（云南、贵州、广西和部分四川）的所有海拔大约高于300米的区域。这是一片囊括大约100万多样化的少数民族和语言多样性的2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地理上，它以东南亚大陆（the Southeast Asian mainland massif）地块著称。<sup>①</sup>

斯科特选择称之为“佐米亚”的区域与冯·申德尔的提议并不相符，但正如这一引文指出的，它符合其他人称之为东南亚地块的区域，而且，这一相似性值得进一步解释一下。

也许，如斯科特所建议的，这样一个非地理概念的佐米亚，可能看起来更适合东南亚地块这样一个作为社会空间而非地域空间的名称。这一同样的困境也适用于安第斯山、亚马逊、地中海或喜马拉雅地区的社会与文明。这些区域的社会与文明尽管也有这样的关切，几十年来广泛而有益地使用这样的名称。冯·申德尔的佐米亚概念在其地理、文化及语言等方面的定义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主要建议的是宽泛的政治标准而不是精确的边界。相对照之下，正如我将在下面讨论的，东南亚地块的概念来得更具有操作性，且它的内在逻辑也界定得更清晰。人们讨论这一概念的时间比冯·申德尔的佐米亚稍长一些，也因此有时间比较精确地把握它的特征。本期特刊多数撰稿人的研究基于亚洲陆地东南部——东南亚地块——的地理范围之内，从而以不同方式削弱了它的逻辑性。

冯·申德尔“佐米亚”概念中所指的区域与东南亚地块所覆盖的区域不同，二者只有东佐米亚部分是重合的，这一区域也是斯科特所关注的地带。

<sup>①</sup> 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某种程度上，我理解冯·申德尔划定大佐米亚的原因和赋予它宏观地理形态逻辑的做法，这一大区域所囊括的社会多样性拒绝任何结论性的文化评估。基于地方志和区域史，巴基斯坦游牧的普什图族、克什米尔的古加尔牧民、中尼边境的夏尔巴农民、西藏西部的牧民、缅印边境上的园艺种植者钦人、滇中处于封建社会的彝族与白族、广西西半部高度汉化的壮族、穿梭于各社会群体中的回民（中国穆斯林）商人，以及生活在老挝南部和越南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南岛语族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居于对诸如语系、宗教系统、不同的社会结构、迁徙模式以及来自外界的不同影响等这样一些文化因素的考虑，作为社会人类学家的我，对在社会研究中，把这些区域作为一个内在联系体的实际操作性表示质疑（cf. Formoso）。不容置疑，冯·申德尔是从宏观的、历史的和政治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他不可能像社会人类学家或是人文地理学家那样对文化差异的细节那么关注。

几年前，在做关于《东南亚地块民族的历史词典》一书时，我不得不为所遇到的“东南亚地块”这一条目做出详尽的解释。这一名称最初来源于林朱乔（Lim Joo Jock）写的这篇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章：“领土权利范畴、东南亚和中国：涵盖一切的山地地理战略。”<sup>①</sup> 当时尽管在文章中，以及在我所编辑的文集《动荡的时代和坚韧的民族：东南亚地块的山地民族》中曾多次使用过“东南亚地块”这一术语，我和其他的一些学者都没有意识到有必要或义务对这一区域进行定义。直到2006年编纂字典时，我才决定把区域性历史进程、政治集权化（political crystallization）、语言扩散、族群分类和迁徙，以及地理特征等元素包含在内。

从该地带显著的外部维度入手，基于这一大区域特别复杂的地形和频繁的人口流动，用精确的海拔、纬度、经度，以及特定的外部限制和内部分支来界定这块区域不太现实也没有意义。<sup>②</sup> 然而从最大限度上来看，这些高地族群大多散居在海拔300—500米的地带，所包括的区域大概有西欧那么大。以

---

<sup>①</sup> 参看让·米肖（Jean Michaud）《泰国一个苗族村寨的经济转型》（*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a Hmong Village of Thailand*）。同前，参看《从中国西南到印中的上部：苗族移民概观》（*From South-West China into Upper Indochina: an Overview of Hmong (Miao) Migrations*）；同上，参看《动荡的时代》（*Turbulent Times*）。

<sup>②</sup> 参见如下例子。关于婆罗洲（加里曼丹的旧称），参看伯纳德·赛拉托《婆罗洲雨林的游牧民：经济、政治和定居的意识形态》（*Nomads of the Borneo Rainforest: the Economics, Politics, and Ideology of Settling Down*）；关于印度尼西亚，参看塔尼亚·默里·李（Tania Murray Li）编辑的《改变印度尼西亚的高地》（*Transforming the Indonesian Uplands*）一书中的《边缘性、权利和生产：高地改革的分析》（*Marginality, Power, and Production: Analyzing Upland Transformations*）。

划分中国南北温暖的长江（扬子江）为界，东南亚地块向南延伸，涵括了从东到南，从喜马拉雅山到西藏高原这一带的高山区域，还有那些受季风影响，被来自雅鲁藏布江下游、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中国境内称怒江）、湄南河、湄公河、红河（Song Hong），以及珠江流域水流所冲刷的高地国家。在中国，佐米亚地块包括了西藏的最西边，四川的西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广东西部的一小块区域，整个贵州和云南，广西的北部和西部，以及海南岛的高地这些区域。从东南亚半岛延伸出来，佐米亚包括了与缅甸接壤的印度东北部，孟加拉东南部这一大片边界区域，泰国的北部和西部，湄公河谷以上的老挝，沿东部安南山系越南的北部和中部边界地带，以及柬埔寨的东北部边沿地带。

我未把超出东南亚地块以北界限的重庆盆地包含在内的原因主要在于，一千多年前这一区域曾受汉人统治，大量的人口涌入海拔 500 米以上，被四川中部和西部称为“米饭碗”的肥沃之地。出于同样的原因，北方的甘肃和山西同样也未被包含在这一区域内，因此东南亚地块北方的界限大致是沿扬子江来划分的。在最南端，我认为马来西亚半岛高地不应该被包含在内，因为它被泰国西南部的克拉地峡所隔断，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和马来世界的关系更亲密<sup>①</sup>。那就是说马来西亚半岛高地上很多属于南亚语系的原住民，例如奥拉阿斯利（Orang Asli），和东南亚地块上的佉、克木等还有巴纳族群都有关联。

冯·申德尔最初关于佐米亚定义的区域和东南亚地块所包含的区域范围很接近，有意把西藏自治区，与之毗邻的新疆、青海、四川，以及尼泊尔、不丹和印度的高地排除在外。我也决定不把西藏纳入到东南亚地块，撇开它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一员这一无可辩驳的身份，从历史上来看西藏和藏文化给周边文化带来的影响更适合把它看作是一个独特的实体。<sup>②</sup> 西藏世界有自己的内部逻辑：它是一个政治上中央集权、宗教上和谐统一，有着悠久历史、特色鲜明的政治存在，是一个可以被划归到“封建”帝国范畴的实体。这是历史上与东南亚地块有关联的其他社会群体基本达不到的。<sup>③</sup> 在这个意义上，西

<sup>①</sup> 霍尔（Halling）《历史》（*History*）；塔林（Tarling）《剑桥的历史》（*Cambridge History*）。

<sup>②</sup> 参看萨拉·施耐德曼（Sara Shneiderman）《喜马拉雅的中心在“佐米亚”吗？——一些跨越时空的学术和政治思考》（*Are the Central Himalayas in Zomia? Some Scholarly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cross Time and Space*）。

<sup>③</sup> 梅尔文·C·戈德斯坦（Melvyn C. Goldstein）《现代西藏的历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方学术界关于东南亚地块的限定，既是历史和政治的，又是语言学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当然，这并非是绝对的。西藏周边地区的族群，例如中国云南的康巴人<sup>①</sup>、纳西族、独龙族、摩梭人、珞巴族（Lopa），或是锡金的布提亚人（Bhutia），历史上曾几度与古代西藏保持或近或远的关系。此外，藏缅语系和藏传佛教延伸到青藏高原的东端，其边缘地区很直观地呈现出多种文化传统的交融性。

如需进一步细数东南亚地块的特征，一系列核心要素需要被考虑在内：首当其冲的是历史，其次是语言、宗教、传统的社会结构、经济以及与低地邦国的政治关系。广袤的生态系统、边缘化的状态以及与主体民族之间的从属关系，所有这些高地族群所共享的特性不足以掩盖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四大语系在这里纵横交错，但没有哪一种语系占主导地位。说到宗教，一些族群信仰万物有灵，一些信仰佛教，一些信仰基督教，很大一部分信奉道教和儒家的价值体系，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体仍然保留着不同信仰的复合体。纵观历史，世仇和当地群体之间频繁的敌对状态是文化多元性的证据。<sup>②</sup> 这一区域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统一过，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帝国，或是几个世仇邦国共同的空间，抑或是几个政体和谐共处的区域。那些主要表现为世系制与封建制对抗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典型的政治组织在这一带长期地存在着。<sup>③</sup> 从今天国家层面来看，不同国家的不同政体（民主国家、三个社会主义政权、一个合乎宪法的君主政体、一个军事独裁制政权）共享着这一块区域，这样的现状充分显示了东南亚地块在古代时期的政治多样性特征。

从世界范围来看，和喜马拉雅山一带其他跨国区域的高地一样，用历史、经济和文化的术语来表述东南亚地块，更别提冯·申德尔的佐米亚，都是边缘化的和碎片化的。作为亚洲研究这一大背景下具有研究前景的区域分支研究，东南亚地块缺乏应有的实际价值。然而我并不想成为这一新的亚洲区域分支研究的旗手，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研究，探讨跨边境和边缘社会。

在对整个东南亚地块进行细致的调查后会发现，这一区域的民族和主体

---

① 在格尔施（Giersch）的《穿越佐米亚》（*Aross Zomia*）一文中讨论过。

② 赫尔曼（Herman）的《云彩之间》（*Amid the Clouds*）；兰布德-萨尔蒙·克劳丁（Claudine Lombard-Salmon）《中国文化适应的一个例子：18世纪的贵州》（*Un Exemple d'Acculturation Chinoise: la Province du Guizhou au XVIIIe siècle*）。

③ 参看米肖的《历史字典》（*Historical Dictionary*）介绍部分。



民族都是不一样的，如上述提到的那些民族。从地理位置而言，他们都居住在遥远偏僻之处；从政治和经济而言，他们都和地方政权保持着一定距离，处于一种边缘的状态；从文化角度而言，这些高地群体更像是一块色彩对比鲜明的文化马赛克，而非一幅色调和谐的拼图——后者被特里·兰博称为“一场引起幻觉的噩梦”<sup>①</sup>。然而，当从某一特定的距离进行观察时，这块马赛克也可以成为一幅与众不同的、有着特殊意义的图画，尽管有时这样的描述不尽准确，但这些正是冯·申德尔和斯科特所做的，为此他们应该得到嘉奖。

让我们回到斯科特的佐米亚，把有关印度和西藏外围喜马拉雅人口的讨论留给萨拉·施耐德曼和帕德森·格尔施。<sup>②</sup>从历史上来说，如作者之前所探讨过的<sup>③</sup>，这些高地不是被低地帝国作为诸如奴隶等资源的获取地，就是作为他们之间领地的缓冲地。撇开政治上的统治和隶属关系，确切地说，詹姆士·C·斯科特认为他的佐米亚区域内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凝聚力，正是这种力量把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斯科特尝试用地中海世界的例子来反观佐米亚：

这是一个（即地中海地带）不需要通常意义上统一的领土或政治管理来定义的社会，这是一个通过积极的物流、人流和思想交流来进行维护的社会。从一个稍小的层面来说，爱德华·怀廷·福克斯认为古希腊的爱琴海在政治上虽然从未统一过，但它是一个独特的、社会性的、文化的、经济上的有机体，通过便利的水路，爱琴海上人们之间频繁的接触和交换被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把类似的分析转移到东南亚，斯科特接着补充道：

历史上这种现象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来自马来世界——航海世界中

---

① 参看 A. T. 兰博 (A. T. Rambo) 《越南北部山区的发展趋势》(Development Trends in Vietnam's Northern Mountainous Region) 一文。

② 施耐德曼 (Schneiderman) 的文章《喜马拉雅的中心在“佐米亚”吗？——一些跨时空的学术与政治思考》；格尔施 (Giersch) 的《穿越“佐米亚”》。

③ 参看格尔施 (Giersch) 的《穿越“佐米亚”》(Across Zomia)；费斯克修 (Fiskesjo) 的《采矿》；利姆 (Lim) 的《领土权的势力范围》(Territorial Power Domains)；Wijeyewardene 的《民族》(Ethnic Groups)；安德鲁·沃克的《金船的传奇：老挝、泰国、中国和缅甸边境的规则、贸易和商人》(The Legend of the Golden Boat: Regulation, Trade, and Traders in the Borderlands of Laos, Thailand, China and Burma)。

出类拔萃的一个——其文化从太平洋的复活节岛一路影响到马达加斯加，再到南非海岸。在南非海岸港口人们所说的斯瓦希里语就带有马来文化的印记。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处于全盛时期的马来国，简直可以像汉萨同盟那样成为贸易港口之间的转运联盟（shifting coalition）。最基本的管理国家的单元是如占碑、巨港（又名巴邻旁）、柔佛和马六甲这样的港口，马来西亚的贵族阶层利用政治和贸易上的优势对他们进行洗牌。当面临这样一些远距离的海上群体时，我们陆地国那些“由一系列紧凑相邻的领土组成的‘王国’”的概念在这里就毫无意义了。<sup>①</sup>

以上这些被斯科特用作例子来支撑他把佐米亚当作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社会空间的论据。然而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同相对容易到达的海洋水路相比，东南亚地块就不像水上群体那样易于协商。<sup>②</sup>

## 佐米亚区域内的国家、边界及其人类群体的能动性

让我们撇开斯科特的文章，来看一下一个世纪前的“佐米亚”；它是一个非国家的空间，那里小邦林立，比如云南西双版纳说泰语的勐（Muang），在越南境内的西双楚泰国（Sip Song Chau Tai），在老挝境内的澜沧国（Lan Xang），缅甸的掸邦，<sup>③</sup>南诏“封建”政权，还有云南和贵州的彝、侗、白族<sup>④</sup>。事实上，国家的缺位并不是东南亚高地的主要特征，相反，它是大量小型的，有着松散联系的，处于各种社会形态下小邦国的聚集地。他们在活动的区域内遵循平均主义，但他们从不联合，也从来没有完全地融入周边的政治实体中去。正如帕特森·格尔施和马格努斯·菲斯克修所解释的：那些危险但可行的商旅贸易通道有助于让这些空间上分离的政治实体保持着经济上的往来。

欧洲影响在东南亚扎根之前，该地所盛兴的是曼荼罗式的国家治理模式。封地和帝国中心的外围地带被看作是缓冲区，那里居住着不太文明或尚未开化的人们，他们与帝国核心区所形成的朝贡关系基本能够保证核心区政治上

① 参看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第48-49页。

② 参看格尔施（Giersch）的《穿越“佐米亚”》。

③ 参看孔多米纳斯（Condominas）的《随笔》（*Essai*）；J. Rispaud, *Les Noms à éléments numé raux des principautés tai*。

④ 译注：均为前现代的小国或邦。

的安全和稳定。<sup>①</sup> 相比之下，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把这一文化大陆分区细分为南亚、东亚、中亚（Inner）和东南亚的分法，主要是基于欧洲和中国关于民族国家以及线性边界的概念。

后来，有关东南亚地块的研究被划归至诸如美国协会这样专门研究亚洲的学术机构之名下，其研究小组和论文不得定位于一个既定的次区域。那些为数不多、跨越两个或多个次区域的小组则被归到新近成立的名为“跨边界”的部分，这样的跨区域研究虽然姗姗来迟却势头喜人。<sup>②</sup> 和这一视野相一致，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这一区域研究的结果，大部分政治学家或多或少意识到，由于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建立在国家之上的，少数民族的事宜也应该在国家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克里斯多夫·邓肯编纂的标题为“开化边缘地带”（2004）<sup>③</sup> 这一卷集中，虽然举出相应的例子，并给予每个国家相应的篇幅进行分析，但对于中国或印度周边的区域，或是跨边界讨论的这一部分却是空白的。

然而，“少数群体”或是由它派生而来的“偏远和边缘”这样的分类，只有从低地的视角出发才有意义；只有涉及国家中心产生的关于边缘地带的权威知识（这些知识无论是来自古代年鉴零星的记述、异国最近的研究，还是年代久远的自述）才有意义，只有把它们放在国家背景之下才有意义。<sup>④</sup> 在一个既定的民族国家框架之下来研究高地的社会群体，会将一个个有着紧密联系的文化实体推向诸如“主体-少数、现代的-古代的、文明的-野蛮的”这样的二元论战中。此外，诸如“民族少数”和“少数民族”这些预设的标签不加区别地贴在这些人身上。在过去的100年中，根据一系列原则，许多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关于东南亚地块和佐米亚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证明国家因素如何抑制或消除整个跨边界社会的规模。这一

---

① O. W. 沃尔特（O. W. Wolters）的《东南亚的历史、文化和宗教》（*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Thonchai Winichakul 的《暹罗：一个国家地质体的历史》（*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Michel Bruneau, *Evolution des étagements ethnopolitiques dans les montagnes Sino-Indochinoises*.

② AAS Website, <http://www.aasianst.org/>, accessed February 2010.

③ 参看克里斯多夫·R·邓肯（Christopher R. Duncan）的《开化边缘地带：东南亚政府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Civilizing the Margins: Southeast Asian Government Polic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ities*）。

④ 例如 Ma Touan Lin, *Ethnographie des Peuples Étrangers à la Chine: Ouvrage Composé au XIIIe Siècle ...Traduit...du Chinois avec un Commentaire Perpétuel par le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一书；谭章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The stone threshold in front of the 'narrow door'*；*Christian culture and Miao people's society of the border regions of Sichuan*）一书。



点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看得到，例如库尔德人、吉普赛人、因纽特人、努尔人、玛斯昆族人和婆罗洲土著等群体。作为充满政治意味的边界这一概念人为地割裂了跨边界群体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结构；当把这一概念运用于这些碎片化的小群体时，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也随之被削弱了，更大的实体往往消失在国家边界之外。<sup>①</sup>

社会人类学家们并非否认国家背景和国家定义的重要性，他们的争辩是应该从跨境的角度来研究这些因边界划分出的民族群体文化的完整性，而不仅仅把他们当作某一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严格地把佐米亚和东南亚大陆当跨国界的社会空间来看待有助于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在这一问题上，萨拉·特纳向我们展示了苗族如何很好地利用家族和贸易的网络越过中越边界进行交易，而马格努斯·费斯克修（Magnus Fiskesjo）[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伯纳德·福摩萨（Bernard Formoso）]则探讨了佤族如何利用中缅边界的优势。<sup>②</sup>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跨境研究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对这一占世界一定人口数量人群的关注，历史上这一人群一直处于被曲解和被剥权的境地。

就这一点而言，斯科特的著作对于重新评价这段历史，对赋予高地居民能动性做出了巨大贡献。采用类似政治学家的视野，斯科特粗略地描述了佐米亚区域人类达成的协议和相应的政治关系（即他关于佐米亚的定义）。他在文中写道：

佐米亚是世界上存留下的最大一块还未被完全划归民族国家的区域；这样的时日不多了。然而，不是太久之前，这些自治的人群曾是人类历史上人口数量较大的一个群体。时至今日，河谷地带的人们仍把他们看作是“我们活着的先民”，抑或是“在稻作文化、佛教和文明未出现之前

---

<sup>①</sup> 就这一点而言泰国被看作是典范，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之间，出现了苗族、克伦人或者是阿卡族的成百的专题著作。然而针对各个案例，每个族群的代表作并不多。比如，戈登·杨（Gordon Young）的《泰国北部的山地部落》（*The Hill Tribes of Northern Thailand*）；因加·莱尔·汉松（Inga Lill Hansson）的《泰国北部阿卡人的民间故事》（*A Folktale of Akha in Northern Thailand*）；保罗·E·杜任伯格（Paul E. Durrenberger）的《泰国北部傣傣族的灾难和治疗》（*Misfortune and Therapy among the Lisu of Northern Thailand*）；罗伯特·G·库伯（Robert·G·Cooper）的《苗族群体性别的平等》（*Sexual Inequality among the Hmong*）。

<sup>②</sup> 佐米亚或东南亚地块研究的类似案例研究请参看下列两部作品：让·米肖的《动荡的时代与恒久的民族：东南亚大陆的山地少数民族》；让·米肖和蒂姆·福西斯（Tim Forsyth）编辑的《移动的山：中国、越南和老挝山地民族的生计和种族地位》（*Moving Mountains: Highland Livelihoods and Ethnicity in China, Vietnam and Laos*）。

我们的样子”。然而，我认为山地民族应该被理解为在过去 200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为逃避河谷地带建立国家工程的压迫——奴隶制度、征兵、课税、徭役、传染病和战争——而进行逃逸的、流亡的和孤立的人群。他们居住的大部分区域被称为破碎带或者避难区。<sup>①</sup>

虽然这一大胆的论题并没有以一种透彻的、强有力的以及纪实性的记述方式加以论证，但是与斯科特观点相容的那部分以前已经讨论过了。一般地，借助那些对表现出逃逸策略者的实地调查，总是人类学家先展开这样的讨论。19 世纪 60 年代在北亚马逊盆地和当地各群体合作一段时间之后，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在 1974 年发表了一篇简短的题为《抵抗国家的社会》（*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sup>②</sup> 克拉斯特的论点在于讨论前哥伦布时期美洲那些被称为原始社会的群体，他认为那些缺乏复杂分层社会结构的群体并不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发现社会分层。相反，克拉斯特推测，经过时间的沉积，那些社会群体形成了一种避免陷入社会分层困境和承诺的能力。对他而言，这些所谓原始社会存在的目的正是为了避免他们当中出现国家。在当时的法国，克拉斯特的论文引发了人们激烈的讨论。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现代性罪恶的极力反抗遭到人们的指责，人们认为他在把这群“高贵的野蛮人”浪漫化，一些人或许觉得这样的批评也适用于斯科特。

斯科特向皮埃尔·克拉斯特表达了对他的感激之情，克拉斯特“在充分的、新的证据支撑下，其对后统治时期南美逃离和躲避国家控制的原住民大胆的诠释……具有很强的洞察力”<sup>③</sup>。他也向冈萨洛·阿吉雷·贝尔特兰（Gonzalo Aguirre Beltrán）对于墨西哥人类学家所命名的“避难所区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分析表示感谢。<sup>④</sup> 同时他引用了其他一些在全球范围内探讨类似情况的学者的观点，那些被征服的社会看起来想把自己隔离起来，忽视或拒绝国家对他们的控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意识到北非的马格利布（Maghreb）也存在这样的生存模式，为远离定居下来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和躲避后者势不可当的文化浪潮，那里信仰万物有灵的柏柏尔人宁愿选择

① 参看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第 9 页。

② 参看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的《抵抗国家的社会》（*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一书。

③ 参看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第 13 页。

④ 参看冈萨洛·阿吉雷·贝尔特兰（Gonzalo Aguirre Beltrán）的《避难所区域》（*Regions of Refuge*）。

游牧的生活方式而非定居某地。<sup>①</sup> 施瓦兹 (Schwartz) 和所罗门 (Solomon) 记录了在欧洲统治时期, 天主教会在巴西企图让印度土著定居下来, 并试图改变他们的信仰, 这一尝试引发了希瓦罗人和扎帕罗人 (Zaparo) 沿袭一场古老的撤离方式, 反映的是一种对印加帝国进行抵抗更古老的模式。<sup>②</sup> 有意思的是在后一个例子中, 与佐米亚的情况正好相反, 占统治地位的印加人住在高地, 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则被驱赶至疾病蔓延的低地热带雨林。再一次强调我们在分析中要避免赋予过多的原始效能在海拔上, 把它当作划分社会的标志。

斯科特也注意到理查德·怀特 (Richard White) 记录的一群美洲印第安人, 一个世纪后在更往北的地方, 如何利用北美五大湖区作为避难所来躲避美国和法国的殖民统治。<sup>③</sup> 在欧洲, 斯科特指向罗马的吉普赛人如何马不停蹄地躲避各国对他们的控制、囚犯以及 15 世纪逃亡到哥萨克前线的俄罗斯农奴。在亚洲, 他用拉铁摩尔关于为了躲避汉人的同化而逃到山上的小型社会的研究 (1962); 罗伯特·哈夫纳关于爪哇高地印度教徒腾吉里人 (Tengeri) 躲避控制岛屿的强大穆斯林邦国的著作; 还有基辛关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山区 (Northern Cordillera) 尹富高省的结论 (1976)。斯科特还大量使用了关于缅甸高地有影响力的分析 (1952), 在那里, 平均主义的克钦社会根据情况与战略性目的, 在他们基于亲属制度的地方权力形式和他们的低地封建社会邻居掸族更集权化的政治组织之间来回摇摆。<sup>④</sup> 在这些令人信服的研究之上, 我们还可以加上帕德森·格尔施 (Patterson Giersch) 关于清朝如何逐步控制云

① 参看欧内斯特·盖尔纳 (Ernest Gellner) 的《圣人的地图集》(Saints of Atlas) 一书。

② 参看斯图尔特·施瓦兹 (Stuart Schwartz) 和弗兰克·所罗门 (Frank Solomon) 合著的《新民族和新国民: 南美土著社会 (殖民时期) 的适应、调整和种族进化》(New Peoples and New Kinds of People: Adaptation, Adjustment, and Ethnogenesis in South American Indigenous Societies (Colonial Era)) 一文。

③ 参看理查德·怀特 (Richard White) 所著的《中间立场: 五大湖区的印度人、帝国 (君权) 和共和政体, 1650—1815》(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1650—1815)。

④ 欧文·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历史上的边疆》, 载《边疆史研究: 论文集 1928—1958》,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2 年; 罗伯特·W·哈夫纳 (Robert W. Hefner) 《印度教爪哇人: 腾吉儿传统与伊斯兰》, 普林斯顿, NJ: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菲利克斯·M·基辛 (Felix M. Keesing) 《北吕宋民族史》, 斯坦福, CA: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6 年; 埃德蒙·利奇 (Edmond Leach) 《缅甸高地政治制度: 克钦社会文化研究》, 剑桥, MA: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4 年。关于利奇, 同样可以参见: 乔纳森·弗里德曼 (Jonathan Friedman) 《亚细亚社会形态演化中的制度、结构与矛盾》, 沃尔纳特克里克, CA: Altamira Sage, 1998; 还有曼迪·萨丹 (Mandy Sadan) 和弗兰索瓦·罗宾内 (Fransois Robinne) 编辑《东南亚高地的社会动态学: 重新考虑 E. R. 利奇的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 莱登, 布里尔, 2007 年。

南的西双版纳的深入研究。或者，还有伯纳德·赛拉托（Bernard Sellato）和让罗姆·卢梭（Jerome Rousseou）关于婆罗洲<sup>①</sup>高地丰富多彩的研究，这是一个与佐米亚极富可比性的地区。他们观察到，那里的浦南（Punan）游牧民与迪亚克（Dayak）农民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恰好可以避免臣属于他们。类似地，阿兰·泰斯塔特也陈述道，那些世界各地被包围的狩猎——采集社会的流动性，体现了他们想同包围他们的农耕民族的控制保持一定距离的愿望。<sup>②</sup>

斯科特的分析有一个与他所谓的“褶皱的地形”相关的非常创造性的想法。<sup>③</sup>对他而言，这一概念是他解释为什么佐米亚地区的小型社会选择高地作为庇护所的原因的一部分。艰苦而难以到达的地域环境，具备了一定的安全感，那样的地形又可以社会性地加以设计，使本已连绵起伏的山地更加难以通过。相反地，想到达那里并控制这些群体的雄心勃勃的国家，却可以通过一系列“缩短距离的技术”，如桥、全天候公路、伐木修路、精确的地图和电报等，缩短连绵起伏的山地距离。先进的脱叶技术、直升机、飞机和现代卫星照片进一步缩小了山地的起伏跌宕。这种“褶皱”并不简单地以力学的方式“在那里”存在着，而是为了某一目的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从逻辑上来说，斯科特观察到，对于那些想把“地形的褶皱”最大化并把它作为一种阻碍国家控制的人来说，可以使用许多对抗性的策略：摧毁桥梁、在关隘设陷阱、沿公路伐木、切断电话电报线路……大部分游击战争（不是如何获取情报的技术那部分内容）的文献都是关于如何利用地形使其有利于自己的做法的。<sup>④</sup>

这样一来，佐米亚居民不只是被动的臣民，而且可以作为主动的参与者（agents）。正如尼古拉斯·塔普（Nicholas Tapp）最近在他评论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一书时说到的那样：

斯科特想把能动性赋予那些被认为是没有能动性的人，来理解历史

① 译注：加里曼丹的旧称。

② 格尔施（Giersch）《亚洲边境》；伯纳德·赛拉托（Bernard Sellato）《婆罗洲热带雨林的游牧人：安顿下来的经济学、政治学与意识形态》，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4年；让罗姆·卢梭（Jerome Rousseou）《中部婆罗洲：分层社会的族群身份与社会生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阿兰·泰斯塔特（Alain Testart）《原始共产主义：经济与意识形态》，巴黎，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1985年。

③ 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第2章。

④ 同上，第166页。

上出现的那些实行刀耕火种、裂变式的亲属制度和口承传统，……等习俗的人们有意识的政治选择与策略化的行为。这是一副与人们通常接受的把这些认为是国家代理不情愿而倒霉的牺牲品、历史上的输家、富庶土地边上的强盗与某些史前遗留下来的化石遗存。<sup>①</sup>

关于这些“设计出来的野蛮人”<sup>②</sup>，斯科特试图告诉我们的是，他们按照外来的处方，试着根据自己所处的独特情况尽可能加以土著化，并以外来观察者不容易解读且具有创造性和文化独特性的方式，炮制出他们量身定制的回应。

## 结论：超越“佐米亚”

大家出于几个原因都同意将这期特刊称为《超越“佐米亚”》。我们选择采用“佐米亚”这个概念是因为，尽管它缺乏精确性，其定义也充满争议，但正是这么一个术语似乎能够不断地引起争论。况且，这个术语具有一种无可估量的品质，它能引起国际社会去关注一个由各种独特社会和几乎没被研究过，却完全值得为世人更好地了解历史组成的（区域）混合体。我们用“超越”（beyond）这个词，因为它强调这么一个事实，即，这一期的每个作者都同意，他们将在自己专门从事调查研究的地点和时段内，通过脚踏实地的研究，用现实来检验佐米亚这个概念。这一检验在一个专业的历史期刊上进行，其作者来自各种学科，从而为仔细权衡超越任何特定学术团体的“佐米亚”这一术语的相关性做出贡献。参与这一研究的所有作者对佐米亚的想法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并在这里以原创者可能没有预见到的方式进行理解与表达。其结果不但推进了关于这个概念学问的学术边界，也扩展了意在包括的有关人类群体的知识边界。

本文出现了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到底是谁需要一个像“佐米亚”这样的概念？我猜，很可能不是那些共同拥有高地的民族国家。如果佐米亚区域的国家语言中都有各具地方特色的名称来指称境内高地的情况确实存在，据我所知，他们还没有一个国家采用了一个功能性的术语来谈论国境之外的高地。

---

<sup>①</sup> 尼古拉斯·塔普（Nicholas Tapp）《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书评》，ASEASUK News, 47, 2010年。

<sup>②</sup> 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第8页。



我们也可以认为，我们谈论的主体们他们本身从未需要过诸如佐米亚、东南亚地块、喜马拉雅地块和高地这些概念。在山上，数百种地方语言有指称本地居住环境的名称，有时明确指称一种具体的地形。但是我怀疑，世居于此的各个社会从未从地方的角度来设想像“佐米亚”这么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有关这些高地的一个或另一个群体的专家们可以确认的是，无论是从实用的角度还是从象征的角度来说，这种规模层次的事物对于高地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通常情况下，社会人类学（而且也包括语言学家，实际上还有阿罗伊·肖特这样的偶然民族志学家<sup>①</sup>）专门只研究一个独特的高地社会群体而不是几个，而且通常只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进行。有数百篇关于傈僳、纳加、布提亚、瑶、苗、傣、哈尼、侗、布依等的文章，都证明了这一趋势。<sup>②</sup>我还怀疑，许多扎根于本土的学者会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佐米亚这个笼统的概念是在一个过于宏观的层面上加以定义的，在他们的学科里并不是一个可操作性的对象。

虽然高地人、他们国家的统治者，还有学术专家们也都不大可能需要佐米亚这么一个概念，它会受到那些为了机构、学术、研究或教学性的目的而想在宏观层面上交流关于“高地”及其民族想法的国际组织与学术界的欢迎。其他跨国标签最近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了，比如环北极研究专门研究北极圈周围的土著人。<sup>③</sup>旨在研究南美洲中部跨国热带雨林地区的亚马逊研究也成立了。这些都表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宏观的视野来研究分布在广袤土地上的大部分人类群体，而且也需要有一个超越政治边界与学科边界的愿望，以便以不同的方式评估当前和未来地方社会的状态。

在亚洲，从长远来看，佐米亚及类似概念与历史学和普通社会科学的相关性，仍有待思考。尽管，它目前很有吸引力，但也有可能证明是昙花一现的。跨越这些高地的公路铁路网的密度的日益增强、通信技术（电视、移动电话、因特网）的几乎全覆盖还有边境地区对贸易和旅游业的逐渐开放，可能很快就会磨平这个区域地形的摩擦（friction of terrain）。这将把这些民族融入更广阔的亚洲，而且，最终融入全球化的世界。

大量的高地人已经离开他们祖先们曾经耕作过的乡村，现在居住在佐米

① 让·米肖《偶然的民族志学家》，第67页。

② 让·米肖《历史学词典》，第273-355页。

③ 见马基维基地图制作（Makiviki Cartographic Service）提供的地图2000，加拿大，<http://www.makiviki.org/en/media-centre/nunavik-maps>（2010年4月1日查询）。北极大学现在提供环北极研究的本科学位。

亚地区及其周边的低地与都市地区。这一运动所涉及的范围是惊人的。克伦和拉枯已经成为曼谷城市周边的非熟练劳工。男男女女的岱依人、泰人、依人在河内的人民大会里代表他们的选区。夏尔巴人在印度北部城市经营旅游业。受过教育的纳西族、白族和彝族在昆明和成都当任公务员。瑶族、侗族和布衣族学术研究人员在贵阳当老师。壮族电脑程序员在南宁和香港推销他们的技术。苗族出租车司机在上海忙忙碌碌。民族流行歌手偶尔登上佐米亚各地的排行榜首。

在相反的方向上，佐米亚地区的每一个国家已经或仍在推进鼓励低地居民到人口压力低于全国水平的高地去追求他们的经济之梦的移民政策。这一政策从20世纪60年代越南的新经济区规划到近年来中国西南地区西部大开发计划。典型的高地城镇就这样在过去的100年左右从主要以土著居民为主的实体演变成巨大的文化杂交所在地。佐米亚地区的土著社会可能迟早会被来自外部的人口整合或取代，使得这一独特的社会空间变得不再那么具有相关性。中国的西藏、新疆等省为我们提供了这一趋势有说服力的例证。

然而，当代的各种联系也很有可能又一次重塑了佐米亚区域，而不是使之消失。<sup>①</sup> 游客要求差异性，而不是千篇一律。多数高地人仍然在乡野里生活与劳作，无论从人口、技术还是从思想方面来说，都很少直接受到低地移民的影响。其结果，从民族方面而言，高地地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低地地区，在未来的许多年里，这一区域的民族多样性仍将继续存在。面对同化，逃跑、避难和反抗的情况是否依旧那么严重，仍有待观察。面对现代化的这一困境，詹姆斯·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一书中谨慎地表明，他对这一情况的解读只适用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情形。然而，他早期关于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和日常反抗的著作中强烈地建议，这一现代化进程也许没有它的支持者预告的那样有效地得到进展。<sup>②</sup>

## 参考文献

Baker, K. M. 1982. On the Problem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

① 见福摩萨《佐米亚人或僵尸？》。

② 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日常反抗的形式》，纽黑文，CT：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年；同前，《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纽黑文，CT：耶鲁大学出版社，1990年。参见本尼迪克特·J. 特里亚·克科夫列特（Benidiet J. Tria Kerkvliet）《农民社会（和我们的）的日常政治》，载《农民研究期刊》，36，第227-243页，2009年。

spectives. D. LaCapra and S. L. Kaplan, eds. pp.197 - 21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ello, David A. 2005. *Opium and the Limits of Empire: Drug Prohibi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1729-185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Beltran, Gonzalo Aguirre. 1979. *Regions of Refuge*.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Mon. Ser.) No. 12.

Biagioli, Mario. 1992. *Scientific Revolution, Bricolage and Etiquette*.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 National Context*. Roy Porter and Mikulas Teich, eds. pp. 11-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oks, James F., with Chris DeCorse, and John Walton ed. 2008 *Small Worlds: Method, Meaning, and Narrative in Mirohistory*.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Bruneau, Michel. 2002. *Evolution des étagements ethnopolitiques des montagnes Sino-Indochinoises*. *Hérodote* 10 (4): 89-117.

Chouvy, Pierre-Arnaud. 2009. *Opium: Uncovering the Politics of the Poppy*.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Clarence-Smith, William. G. 2004 *Horse Breeding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nd Its Borderlands*. In *Smallholders and Stockbreeders: History of Foodcrop and Livestock Farming in Southeast Asia*. Peter Boomgaard and David Henley, eds. pp. 189-210. Leiden: KITLV Press.

Clastres, Pierre. 1987 (1974).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obert Hurley, trans. New York: Zone.

Cohn, Bernard, S. 1981.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owards a Rapprochement?*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2: 227-252.

Condominas, Georges. 1976. *Essai sur L'évolution des Systemes Politiques Thais*. *Ethnos* 41: 7-67.

Cooper, Frederick. 1994. *Conflict and Connection: Rethinking Colonial Af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9 (5).

Cooper, Robert G. 1983. *Sexual Inequality among the Hmong*. In *Highlanders of Thailand*. John McKinnon and Wanat Bhruksascri. Kuala Lumpur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scours-Gatin, Chantal. 1992. *Quand L'Opium Financait La Colonisatoin En*



Indochine. Paris: L'Harmattan.

Duncan, Christopher R., ed. 2004. *Civilizing the Margins: Southeast Asian Government Polic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it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urrenberger, Paul E. 1979. Misfortune and Therapy among the Lisu of Northern Thailand.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52 (4): 204–210.

Eberhard, Wolfram. 2005. *A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Routledge.

Eller J. D. and R. M. Coughlan. 1993. The Poverty of Primordialism: the Demystification of Ethnic Attachmen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6: 181–202.

Evans Grant, with Christopher Hutton, and Kuah Khun Eng, ed. 2000 *Where China Meets Southeast Asia: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Border Regions*. Singapore and Canberra: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Allen & Unwin.

Evans-Pritchard, E. E. 1961.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the University Press.

Fabian, Johannes. 2001. *Anthropology with an Attitude: Critical Essays*. *Ethnology and History*. Ch. (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ailler, Philippe Le. 2001. *Monopole et Prohibition de L'Opium en Indochine: Le Pilon des Chimeres*. Paris: L'Harmattan.

Friedman, Jonathan. 1998. *System,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Asiatic" Social Formations*.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Sage.

Fuchs, Stephen. 2001. *Against Essentialism: a Theo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eerts, Clifford. 1990.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New Literary History* 21 (2): 321.

Gellner, Ernest. 1969. *Saints of the Atla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Giersch, C. Patterson. 2006. *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nzburg, Carlo, with John Tedeschi, and Anne C. Tedeschi 1993. *Microhistory: Two or Three Things That I Know About It*. *Critical Inquiry*. 20 (1): 10–35

Goldstein, Melvyn C. 1989.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31–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ll, D. G. E. 1981.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 MacMillan.

Hansson, Inga Lill. 1984. *A Folktale of Akha in Northern Thailand*.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Hefner, Robert W. 1985. *Hindu Javanese: Tengger Traditon and Isla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erman, John E. 2007.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ill, Ann Maxwell. 1998. *Hill, Merchants and Migrants: Ethnicity and Trade Among the Yunnanes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Jenks, Robert D. 1994. *Insurgency and Social Disorder in Guizhou: the Miao Rebellion, 1854-1873*.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Jock, Lim Joo. 1984. *Territorial Power Domains,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the Geo-Strategy of an Overarching Massif*.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alb, D. and H. Tak. 2005. *Critical Junctions: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York: Berghahn.

Keesing, Felix M. 1976. *The Ethnohistory of Northern Luz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erkvliet, Benedict J. Tria. 2009. *Everyday Politics in Peasant Societies (and Our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6 (1): 227-243.

Ladurie, Emmanuel Le Roy. 1975.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a 1324*. Paris: Gallimard.

Lattimore, Owen. 1962. *The Frontier in History*. I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ach, Edmund. 1954.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hman, Frank K. 1963. *The Structure of Chin Society*.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i, Tania Murray, ed. 1999. *Marginality, Power, and Production: Analyzing Upland Transformations*. In *Transforming the Indonesian Uplands*. pp. 1-44. Amsterdam: Harwood.

Lin, Ma Touan. 1883. *Ethnographie des Peuples Étrangers à la Chine: Ouvrage Composé au XIIIe Siècle ... Traduit ... du Chinois avec un Commentaire*

Perpétuel par le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Paris: Ernest Leroux.

Lieberman, Victor. 2003.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In Volume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ume 2: *Mainland Mirrors: Europe, Japan, China, South Asia, and the Isla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mbard-Salmon, Claudine 1972 *Un exemple d'Acculturation Chinoise: La Province du Guizhou au XVIIIe siècle*. Vol. 84. Paris: Publicatio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eme-Orient.

McCoy, Alfred W. with Cathleen B. Read and Leonard. P. Adams III 1989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Harper Torchbooks.

McKinnon, John and Jean Michaud. 2000. *Presentation: Montagnard Domain in the South-East Asian Massif*. In *Turbulent Times and Enduring Peoples: the Mountain Minor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Massif*. J. Michaud, eds. pp. 1–25.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Merry, Sally Engel. 2006. *Trans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Local Activism: Mapping the Middl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8 (1): 38–51.

Michaud, Jean. 2006.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Peopl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Massif*.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7. “Incidental” ethnographers: *French Catholic Missions on the Tonkin-Yunnan Frontier, 1880 – 1930*. p. ix. Leiden and Boston, MA: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a Hmong Village of Thailand*.

*Human Organization* 56 (2): 222–232. 1997. *From South-West China into Upper Indochina: An Overview of Hmong (Miao) Migrations*. *Asia-Pacific Viewpoint* 38 (2): 119–130

Michaud, Jean and Tim Forsyth, eds. 2010. *Moving Mountains: Highland Livelihoods and Ethnicity in China, Vietnam and Lao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Pluvier, Jan. 1995. *Historical Atlas of South-east Asia*. Leiden: Brill.

Rambo, A. T. 1997. *Development Trends in Vietnam's Northern Mountain Region*. In *Development Trends in Vietnam's Northern Mountain Region*. D. Donovan, A. T. Rambo, J. Fox, and Le Trong Cuc, eds. p. 8. Hanoi: National Political Publishing House.

Rispaud, J. 1937 *Les Noms à éléments numériques des principautés taï*,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29 (2): 77-122.

Rousseau, Jerome. 1990. *Central Borneo: Ethnic Identity and Social Life in a Stratifie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lins, Marshall. 1999. What is Anthropological Enlightenment? Some Less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8: i-xxiii.

Schendel, Willem Van. 2002.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 (6): 647-668.

Schotter, Aloys. 1908. Notes Ethnographiques sur les Tribus du Kuoy-Tcheou (Chine). *Anthropos* 2: 397-398.

Sadan, Mandy and Francois Robinne, ed. 2007. *Social Dynamics in the Highlands of South East Asia: Reconsidering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by E. R. Leach. Leiden: Brill.

Schwartz, Stuart, and Frank Solomon. 1999. New Peoples and New Kinds of People: Adaption, Adjustment, and Ethnogenesis in South American Indigenous Societies (Colonial Er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Native Peoples of the Americas*. Stuart Schwartz and Frank Solomon, eds. pp.443 - 50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ames C.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ellato, Bernard. 1994. *Nomads of the Borneo Rainforest: the Economics, Politics, and Ideology of Settling Dow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hneiderman, Sara. Are the Central Himalayas in Zomia? Some Scholarly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Across Time and Space. pp. 289-312.

Tan, Zhang. 1992. "Zhai men" qian di shi men kan: Jidu Jiao wen hua yu chuan Dian Qian bian Miao zu she hui The stone threshold in front of the "narrow door": Christian culture and Miao people's society of the border regions of Sichuan, Yu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Kunming: Yunnan jiao yu chu ban she Yunnan Sheng Xin hua shu dian jing xiao.

Tapp, Nicholas. 2010. Review of James C. Scott's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

erned”. ASEASUK News: 47.

Tarling N. 1992.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estart, Alain. 1985. *Le Communisme Primitif, Vol. 1: Economie et ideologie*. Paris: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Thomas, Keith. 1963.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Past and present 24: 3–24.

Thomas, Nicholas. 1996.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lan Barnard and Jonathan Spencer, eds. pp. 273 – 277. London: Routledge.

Tonkin, Elizabeth. 1975. *Implications of Oracy: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Oral History* 3 (1).

Vansina, Jan. 1985. *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Oral Tradition: A Study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H. M. Wright,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Valeri, Valerio. 1994. *Our Ancestors Spoke Little: Knowledge and Social Forms in Huauilu*. In *Halmabera and Beyo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the Moluccas*. Leontine E. Visser, eds. pp. 195–212. Leiden: KITLV Press.

Walker, Andrew. 1999. *The Legend of the Golden Boat: Regulation, Trade and Traders in the Borderlands of Laos, Thailand, China and Burm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White, Richard. 1991.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165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jeyewardene, Gehan. 1990. *Ethnic Group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Winichakul, Thonchai. 1994.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Wolters, O. W. 1999.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Revised edn.) Ithaca, NY, and Singapore: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and Institut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Yang, Bin. 2009. *Between Wind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Young, Gordon. 1962. *The Hill Tribes of Northern Thailand*. Bangkok: The

Siam Society.

AAS Website

<http://www.aasianst.org/>, accessed February 2010.

Makivik Cartographic Services

2000 Map. <Http://www.makivik.org/en/mediacentre/nunavik-maps>, accessed April 1<sup>st</sup>, 2010.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The ICIMOD described itself as “ a regional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centre serving the eight regional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Hindu Kush-Himalayas-Afghanistan, Bangladesh, Bhutan, China, India, Myanmar, Nepal, and Pakistan. <Http://www.icimod.org/>, accessed March 31<sup>st</sup>, 2010.